

江冬秀一语化尴尬



胡适与夫人江冬秀

江冬秀是民国著名学者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的妻子,她从小受封建礼教影响,但并不像其他小脚女人那样羞怯、胆小、深居简出。她性格泼辣,有魄力,有才干,遇事能决断,而且幽默。

1926年,叶公超回国后在北平英文系任教,因为他的文学造诣也非常高,很快与胡适成了好朋友。一次,二人因为一些琐事由争论到争吵,谁也不肯相让,最后两个人闹起了别扭。

叶公超感觉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这一天,他亲自登门到胡适家,想着自己先退一步,化解二人的矛盾。一进门,他就像往常一样,叫嚷起来:“胡帅哥,我来了,中午留我吃饭吧!”谁知,胡适根本不买账,也不接话,转身进书房了,搞的叶公超非常尴尬。

叶公超觉得,既然来了,就不能一走了之。于是,他压住心里的火,直接上楼找胡适,可就门口,江冬秀把他给拦住了。叶公超不解,想让她躲开,他想进屋直接和胡适谈一谈,可这时,江冬秀大声地说:“先生还是不要进适之的房子了,他和一堆死人在一起呢。”叶公超听后吓了一跳,愣在了那里。这时,胡适也从里面出来了,指着江冬秀的鼻子骂道:“你才与一堆死人在一起呢。”“你本来就与一堆死人在一起,对不对?”江冬秀毫不相让。叶公超不明白怎么回事,急忙问江冬秀怎么回事,江冬秀一本正经地说:“先生,适之书房里的书大都是历史人物,不都死了吗,难道我说错了吗?”叶公超一听,大笑起来,就连在一旁的胡适也没绷住,也跟着笑了起来,二人的矛盾靠着江冬秀的幽默,也就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据《思维与智慧》

胡雪岩不与“草”争利

传说,胡雪岩在经营庆余堂之初,一天,店里来了一个山东的药材商。一番寒暄之后,药材商对掌柜说,他从山东河北等地新购了一批药材。他拿出样品给掌柜看,掌柜经过一番仔细鉴别,发现这些都是质量上乘的新鲜药材。掌柜大喜过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以较低的价格定下来这批药材。

可几天过去了,不见这个药材商把药材送来,掌柜担心有变,就派伙计出去打探消息。伙计出去不久,就跑回来报告说,山东的药材商已把药材卖给了不远处的另一家药店德仁堂,此刻正在外面准备卸车呢。

掌柜一听,非常气愤,就气呼呼地带着几个人前去找那个药材商理论。药材商两手一摊,皱着眉头,为难地说:“不是我有意背信弃义,而是这家药店出的价更高。您知道我也有一家老小要养活。”

掌柜生气地说:“这家店给你出的价是多少,我再给你每斤多加五毛钱,只要你肯卖给我。”德仁堂药店的老板急了,

两人就在当街上争执起来。大街上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时,恰好胡雪岩外出办事回来。他坐在轿子上正闭目养神,突然感觉轿子停了下来,他掀开帘子问轿夫发生了什么事情。轿夫说,前面可能有人在吵架。胡雪岩走下轿子,信步向前走去。他透过人群,一眼看见自己的店掌柜正瞪着眼,脸红脖子粗地跟人吵着什么。

他拨开人群,走上前去,掌柜赶紧上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胡雪岩刚听了几句,就向德仁堂的老板作揖道歉,“对不起,是我对手下管束不严,请多包涵!”然后带着掌柜和手下人冲出人群的包围向店里走去。

回到店里,掌柜不服气地说:“是那个药材商有错在先。您干嘛那样低三下四,对那个人道歉呢?生意场上的竞争再正常不过了。”

胡雪岩呷了一口茶,爽朗地大笑,然后说:“德仁堂药店刚开张不久,还没有立稳脚跟。

咱庆余堂经营已经一段时间了。欲为大树,不与草争。要想把咱庆余堂做大做强,就不要与草争利……首先你不该仗着咱有一些实力故意压低价格,才使得药材商出尔反尔;其次,你不该哄抬价格与德仁堂老板争执,有以大欺小之嫌。这些都是与咱庆余堂要做杭州第一家甚至南方第一家药店的初衷是相背离的。”

掌柜听了非常惭愧,他当即红了脸,垂下头来。从此,庆余堂诚信经营,果真生意越来越好,因此,才成就“南有庆余堂,北有同仁堂”的著名品牌。

据《羊城晚报》



秉烛夜读 陈伯吹

陈伯吹是中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教育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与奠基人,被誉为“东方安徒生”。

陈伯吹从1923年起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他怀着“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执着愿望,74年笔耕不辍,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儿童文学事业,创作和翻译了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出版了百余种著作。他的儿童文学创作、翻译和理论研究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宝贵遗产。著有童话集《一只想飞的猫》、评论集《儿童文学简论》等。出版翻译了数十种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包括影响很大的《绿野仙踪》《普希金童话》等。陈伯吹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与他的刻苦学习、勤奋读书是分不开的。

1922年春天,16岁的陈伯吹从宝山甲种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分配到了该县杨行乡立第六国民学校朱家宅小学担任教员。作为一位儿童文学家,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模范同学》也是在这所乡村小学里诞生的。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压缩为6万字,并改名为《学校生活记》。此后,宝山县教育局以陈伯吹办学成绩优良,给予他嘉奖,并破格把他从朱家宅调到宝山县立第一小学去当初级部主任。在那里,陈伯吹于每晚九点的熄灯钟敲过以后,就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孜孜不倦地笔耕到很晚。

宝山县立小学校长赵镛是个有识之士,为了支持这个年轻人,额外地再给他一支“白礼士”牌的“洋”蜡烛,对他说:“要早点休息,这只蜡烛点完,总差不多了吧!”点完这支蜡烛,也已经是午夜一时左右了。陈伯吹每晚如此,终年不断。好在他那时候年轻,精力充沛,好像每天都有无限的热情和希望,在鼓舞着他,让他乐在其中,不知疲倦。

据《人民政协报》

开国中将王必成素以冷面著称,敢于仗义执言,一副看似冷漠的外表下,却蕴藏着古道热肠。

在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为粟裕多年的部下,王必成被指定发言,希望他带头揭发和批判粟裕。王必成点头“答应”了,说:“主持会议的同志指示我,要我揭发大阴谋家粟裕。我跟随粟裕作战多年,对他的‘大’和‘谋’深有体会。记得济南战役尚未结束,他就向毛主席建议进行淮海战役,这个‘谋’有多‘大’,我是小人物,不敢评论,也没有资格评论,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很清楚;至于‘阴’的一面,我不知道,也没有体会。”

这番发言,掷地有声。在当时的形势下,敢说出这样一番言论,王必成的刚直可见一斑。他的这番发言震撼了一些人,也感动了一些人。贺龙就曾说过:“王必成可深信,可深

王必成将军「揭发」粟裕

交。”王必成将军之女王苏炎在回忆父亲时说:“父亲寡言,但是绝不人云亦云。他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是不会轻易地改变和屈服的。在自己的遭遇上,他选择沉默;对于他崇敬的粟裕大校的遭遇,父亲无法忍受心中的愤怒。”

王必成戎马一生,很少流泪。但是当粟裕去世的噩耗传来,他忍不住泪流满面,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心中一直愤愤不平,不相信加在粟裕身上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后来,他要给当时的总政治部写信,谈给粟裕平反的事情。粟裕夫人楚青顾全大局,阻止了他。

1994年,刘华清、张震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刊登出来。楚青看到后,立即把登有这篇文章的报纸放在王必成的遗像前,告诉他,粟司令已经沉冤昭雪,以告慰他在九泉之下的亡灵,让他得以安息。

据《老年生活报》

骆秉章人走茶不凉

晚清将领骆秉章位列“晚清八大名臣”之一。虽然位高权重,但平日里乐善好施。他手下有一个叫张全的小吏,家境清寒,与身患残疾的老母相依为命。骆秉章命侄子每月底都给张全家中送去米粮。

一天,侄子向骆秉章汇报完事情正准备离去,骆秉章突然叫住他:“你这月有没有给张全家送米粮?”侄子答:“没有。他上月不是已经不再为您做事了吗?”骆秉章听后,起身倒了杯热茶放在暖炉边,然后拉着侄子去园中走了一圈。等再回到书房,骆秉章把那杯依然温热的茶递给侄子。那杯茶问:“倒了茶离开,然后再回来时,你是希望茶变得冰凉,还是依旧温热?”“当然希望温热。”“这就对了。”骆秉章说,“张全刚离开,如今尚未安顿好,正是最忙乱的时候。我们再帮他几次,等他走上正轨后再放手也不迟。何必人一走,就让茶凉掉呢?”

据《老年日报》

冯玉祥倡导科学种菜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冯玉祥出任北洋政府西北边防督办,督办公署设在察哈尔(1912年建省,1952年撤)省会张家口一个叫做“兔耳沟”的地方。

冯玉祥在张家口交了几个外国朋友,其中有位德国业余园艺师,中文名字叫梅顺生,他把栽培技术引进张家口,种的西葫芦个个都长到七八斤重。有一次他送来三个瓜,冯玉祥很珍重,但想到白放着不如做示范,于是干脆带着这“弟兄仁”进行“巡展”,每到一地,便召集村民参观,然后以理说服农人定要科学种田。他诚恳地告诫大家:“为啥咱们(种)的瓜又瘦又小,有的才跟拳头一样?就是咱们墨守成规,不求进取,不讲究科学种



田!”言犹未尽,又启发众人:“我们中国是农业大国,种地不讲科学,就不会丰收,农民就不会富裕,国家就不会强盛,这么一来,势必受到外国人的欺压!”

此番话语很有成效,由于冯玉祥“牵线搭桥”,农民纷纷学习栽培技术,当地蔬菜种植大有长进。

据《人民政协报》

人人皆知李苦禅先生是国画大师,却极少有人知道,在抗战时期,他还是一名出色的“地下特工”,曾为传递抗日情报被日寇逮捕,险些丢了性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有个叫“新民会”的汉奸组织,想让李苦禅为他们撑门面,被严词拒绝。他辞去了北华美专、北平美术学院的教学职务,决心不为日本人占领的学校做事。

距李苦禅家(柳树井2号)不远处,就是北平新街口教堂的所在地,那里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员黄浩的秘密驻地,在学生黄骥良的介绍下,李苦禅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黄浩情报组”,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

“地下特工”李苦禅

“地下特工”。

为了便于传递抗日情报,李苦禅主动提出将自己家作为“黄浩情报组”的秘密联络点。家里仅有三间简陋的南房。平时,他就利用其中的一间半房屋,一边作画打掩护,一边接待地下党的同志。就在这个小小房间里,李苦禅为八路军传递了不计其数的情报,并帮助许多爱国青年学生和外国友人在此藏身。当然,作为一名党外人士,李苦禅十分懂得地下工作者的规矩,只要是需要他帮助的人,他从来不打听其姓名和去向,每次都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

由于来家里的抗日志士很

多,无形中给李苦禅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压力,时常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为保证这些人转移时能有足够的盘缠,他就悄悄到当铺当了自己的衣物换钱。有时家里粮食吃光了,李苦禅就去粥棚熬粥,全家人挨饿是经常的事。

李苦禅的地下抗日行动,引起了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1939年5月14日,日本人将他抓去严刑拷打:压杠子、抽皮鞭,甚至往指甲里扎竹签……企图逼他就范当汉奸,但李苦禅什么也不说,硬是咬牙坚持住了。由于知名度高、影响大,又没有真凭实据,加上地下党的营救,日本宪兵只好将李苦禅“无罪”释放了。

据《老年生活报》